

~ 修订版 ~

西域考古图记

· 第一卷 ·

[英] 奥雷尔·斯坦因 /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主持翻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修订版 ~

西域考古图记

[英] 奥雷尔·斯坦因 /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主持翻译

X I U T U K A O G U T U J I

· 第一卷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总 策 划：张艺兵
出版统筹：罗财勇
责任编辑：罗财勇
黄 毓
助理编辑：唐俊轩
责任技编：李春林
整体设计：智悦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域考古图记：修订版：全5卷 /（英）奥雷尔·斯坦因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2版．—桂林：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598-1510-1

I．①西… II．①奥… ②中… III．①西域—考古—图集
IV．①K87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952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1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720 mm×1 020 mm 1/16
印张：228 插页：4 字数：3850 千字
2019年3月第2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80.00 元（全五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翻译人员名单及其翻译内容

刘文锁	导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肖小勇	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一至第七节及第九节
胡锦涛	第七章
巫新华	第十三章第八节、第二十六章、第二十七章 附录 A、附录 D、附录 E
赵 燕	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
谢仲礼	第十七章、第十八章
秦立彦	第十九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 第四卷图版目录及图题
姜 波	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
新 华	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
龚国强	第二十九章部分遗物
张良仁	第三十一章
赵 静	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三章
王宗磊	附录 G、附录 I、附录 K、附录 F 一部分 附图图题
丁素琴	附录 F 一部分
徐 华	附录 B、附录 C、附录 H



前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五卷汉译本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这是我国学术界值得欣慰的一件大事。《西域考古图记》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计划出版的《海外遗珍——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论著译丛》(丛书包括英、德、法、俄、日等国考察队20世纪初以来,考察并劫掠我国新疆、甘肃等地珍贵文物后所出版的重要报告和专著)中的第一部。该书和将要出版的本丛书其他著作,对我国考古学范畴的新疆考古学、河西地区考古学、佛教考古学、建筑考古学、古民族文字学、简牍文书学、铭刻学、钱币学和体质人类学等方面,历史学范畴的新疆古代史、河西地区古代史、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方面,民族学范畴的新疆古代民族史和古代民族文化史等方面,宗教学范畴的佛教、摩尼教、景教和祆教等方面,艺术史范畴的雕塑、绘画、音乐和舞蹈等方面,以及地理学、敦煌吐鲁番学、古代社会学、丝绸之路史、东西方经济文化艺术交流史、古代国际关系史、古代服饰史和有关农业、手工业、商业与军事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是1906—1908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和甘肃西部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全部成果的详细报告,也是斯坦因1900—1901年第一次新疆考古调查和发掘后所出《古代和田》报告的续编。《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涉及的地域十分广阔,从西向东包括了今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吐鲁番地区、哈密地区和河西走廊一带。



在这些地区调查和发掘的重要遗址有阿克铁热克、喀达里克、麻扎塔格、尼雅、安迪尔等遗址,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焉耆明屋及其附近的石窟寺和遗址,甘肃西部汉长城和烽燧遗址,敦煌千佛洞和藏经洞等。斯坦因在这些遗址所发现遗物的主要类别有雕塑、绘画、简牍文书(包括汉文、梵文、佉卢文、和田文、龟兹文、吐蕃文、突厥文、粟特文和回鹘文等),织物(丝、毛、麻、棉等)、钱币、碑刻、佛经残卷,以及大量的陶、木、石、金属(金、银、铜、铁等)、玻璃、料器等质料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装饰品和兵器等。书中还配有大量遗迹插图,遗址平面图和剖面图,还有一卷遗物图版和一卷调查地区的地图。全书以考古学为核心,并基本上涵盖了前述诸学术领域,内容十分丰富。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有许多突出的特点:

第一,资料性强,可利用率较高。斯坦因对所调查和发掘的遗址,均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对遗迹和遗物作了详细记录,并进行综合分析,整理后刊于本书中,比较系统和准确,便于利用。

第二,地理学与考古学结合。这是斯坦因考古研究很突出的特点。他除对某些地区进行单独的地理学考察外,还对所到遗址的地貌、河流、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迁及其与遗址的兴废关系进行考察。经他分析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或看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三,涉及的领域广,学科多,信息量大。除考古学外,凡与遗迹和遗物有关的学术领域和学科都程度不等地涉及了,并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此外,他还将所发掘的遗迹、遗物与中亚、犍陀罗和印度、西亚乃至西方的资料进行对比研究,引用了很多西方的研究成果;对遗迹、遗物的渊源关系,遗物的生产技术与制造工艺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信息量很大。这些成果和信息有利于中国学者开阔眼界,了解西方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相关领域研究的历史和发展状况,在批判地吸收其成果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第四,浓缩了斯坦因三次考察相关部分的主要成果。书中凡涉及他第一、三次考察的相关部分,多相互进行比较和印证,并对考察情况进行综合分析研

究,因而浓缩了他三次考察的主要成果。

第五,集众家之长,研究水平高。本书不仅在资料整理方面集中了众多专业技术人员和高水平的专家,在研究方面更是名家荟萃。因此,《西域考古图记》一书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这一领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该书所刊布的资料至今仍是各有关领域的基础资料,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料。今新疆地区(也包括河西走廊)由于是古代东西交通的大动脉,又是丝绸之路的中枢地段,因此成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艺术和多种宗教的交汇融合之地,从而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灿烂的物质文化。在《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中,斯坦因对这种研究难度很大的物质文化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指出了这种物质文化在古代人类文明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其研究成果的影响至今犹存。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限于篇幅,兹不详述,请读者参阅原著。下面仅从资料的角度略举几例,简要说明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斯坦因发掘的尼雅遗址,是新疆已知的遗址中面积最大、保存状况最好、整装性最强的遗址。它为研究古代精绝国和鄯善国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最重要的实物资料。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的众多实物资料极具研究价值,特别是大量佉卢文简牍乃世所罕见,东汉魏晋汉文简牍也弥足珍贵(包括第一次考察时的发现)。这些简牍和其他实物资料,对复原公元3—4世纪尼雅遗址与鄯善的历史和文化、社会构成和社会生活状况、生产关系和经济状况(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对研究鄯善的佛教与佛教艺术、遗物的生产技术和制造工艺,对研究东汉魏晋时期鄯善和西域南道诸国与中原王朝和贵霜的关系以及佉卢文字的演变和传播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现在已重新进行尼雅遗址的考古工作,但斯坦因的资料仍不可替代。

第二,米兰佛寺遗址和吐蕃城堡遗址。米兰佛寺遗址群是研究鄯善佛教与佛教艺术最重要的资料,其塑像、壁画和佛塔遗址在新疆独具特色,并与犍陀罗佛教艺术有密切关系。犍陀罗佛教艺术只发现雕塑,故米兰佛教壁画便



成为研究犍陀罗风格佛教绘画仅有的依据,在学术界和艺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米兰佛寺遗址经斯坦因发掘后已遭破坏,所以斯坦因刊布的资料是无法替代的。斯坦因在米兰吐蕃城堡遗址发掘出大量的吐蕃文简牍等遗物,还有他在麻扎塔格遗址所发现的吐蕃文简牍和其他遗物,都是研究公元8—9世纪吐蕃在今新疆地区活动情况,吐蕃建筑特点和艺术风格,吐蕃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吐蕃社会状况,职官和军事组织情况,吐蕃文字以及吐蕃与唐朝、西域及周边地区关系的极为难得的重要资料。

第三,楼兰遗址,是斯文·赫定首先发现的,但大量的调查和发掘工作是由斯坦因进行的。斯坦因所刊布的楼兰遗址(包括其附近地区)的遗迹、遗物,大量的魏晋前凉时期的汉文简牍文书,以及部分佉卢文简牍文书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可基本复原出魏晋前凉时期西域长史机构的职官系统、屯田概况、社会生活状况、西域长史机构与鄯善及西域诸国的关系。这些遗迹、遗物对研究楼兰古城的性质和鄯善国都的方位以及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他所发现的汉文简牍文书不仅可以补史籍之不足,还可弥补中国简牍史中的缺环,并为木简向纸文书的过渡提供了实证。斯坦因刊布的这些资料,目前仍是最全面、最具权威性的,影响很大。现在国内外学术研究中的楼兰热与此亦有很大关系。

第四,汉长城和烽燧遗址。斯坦因对河西走廊张掖以西的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调查,并对汉代长城的位置、走向、构筑技法,烽燧的分布态势、结构和功能,长城、烽燧附近的地貌、山川形势及其与长城烽燧遗址的关系,长城、烽燧修筑的年代及其与两汉盛衰和西域形势变化的关系,汉长城和烽燧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均作了具体分析。同时他还首次确定了汉玉门关和阳关的位置,发现了许多汉代遗物、汉文简牍和少量粟特文资料。书中所收汉长城和烽燧的资料丰富翔实。迄今为止,国内外所刊布的这个地区汉长城和烽燧的资料,总的来看,尚未有出其右者。此外,斯坦因还劫掠了敦煌藏经洞的文化宝藏(这是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这批珍贵文物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是众所周知的,兹不赘述。



总之,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收录的资料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在此基础上的研究成果及所构筑的基本学术框架,对前述的新疆考古学和敦煌学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这本书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这主要是受当时学术研究总体水平的制约,并与他个人学识的局限性和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政治思想对他有较强的影响密切相关。所以对本书的不足之处,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予以审视和评论。

除上所述,应当指出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所收的遗迹、遗物等全部实物资料,都是通过对新疆和甘肃西部重要遗址的破坏和劫掠而获取的。他在遗址中剥取壁画,搬走塑像,凡能拿走的文物均席卷一空。对此,斯坦因在书中亦直言不讳,因而给那段令国人屈辱而心碎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这些被斯坦因和西方其他列强的学者、探险家所劫掠的中国古代文物精粹,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了巨大的轰动,从而引发了当时欧洲和日本东方学研究的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学术界也因此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开始觉醒,奋起抗争,并积极投身到对这批文物的研究当中。此后,国内外一批新学科陆续建立,一批大学者相继出现,填补了许多学术领域研究的空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凡此都是中国古代珍贵文物本身的价值所致,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瑰宝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这个结果是帝国主义列强所始料不及的,也是与他们的本意相违的。因此,必须将上述情况与他们应受到严正谴责的劫掠行径严格区分开来。

如前所述,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古代文化遗产遭受西方列强空前的浩劫。所有遭到这场浩劫的遗址均被破坏了,珍贵的遗物也没有了,所以斯坦因等人刊布的这些劫掠遗迹、遗物的报告和专著,就成为研究与此相关的各学科仅存的基础资料。但是,由于这些书出版早,价格昂贵,我国当时就很少见,现在更加难寻,因此,很多学者对这些书的详细内容不甚了解。这种状况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故几十年来,几代学者都有将这些书译成汉文出版的强烈愿望,然而限于主客观条件一直未能实现。最近一些年在改革开



放的大好形势下,学术研究的需要和新疆的具体情况,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疆考古学、新疆古代史、新疆古代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研究搞上去。这既是艰巨的学术任务,又是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政治任务,但上述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的匮乏却成为梗阻有关领域深入研究的主要障碍之一。为扭转这种极为不利的被动局面,学术界对翻译出版这些著作充满着殷切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高瞻远瞩的胆识,为弘扬祖国古代文化,促进学术繁荣,加强民族团结,毅然肩负重担,决定投巨资出版列强劫掠中国古代珍贵文物后所发表的主要著作,并立即着手,以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为起点,与我所携手,迅速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和编辑工作。这是对我国学术研究和加强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贡献,对此我们深表敬意。现在,《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已经顺利出版。这是翻译本书的学者们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全体同仁团结奋斗的成果,同时也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广西师范大学领导的支持与关怀密不可分的,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已经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了,以后其他有关重要著作的汉译本将陆续奉献给读者。我们相信这些著作汉译本的出版,一定会促进我国与此相关诸学科研究的发展,并必将会取得更多更好更大的科研成果和重要而良好的社会效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98年10月



再版说明

奥雷尔·斯坦因原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八开本,全五卷,精装版《西域考古图记》,1998年12月出版至今已经20年。经原班人马重新校译修订,新版《西域考古图记》马上就要再版印刷了。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委托,对斯坦因其人和我们的翻译工作做一简单回顾。

奥雷尔·斯坦因(1862—1943),英籍匈牙利人,20世纪初享誉世界的东方学家、中亚考古学家、探险家。中国读者熟悉的探险家斯坦因这个名字,其实只是他的家族姓氏。

19世纪中后期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扩张和武力建立殖民地最为顺手的时期。探索未知地域、寻找新发现成为欧洲列国的时代风尚,也是个人成功之捷径,以及获得巨大荣誉和迅速致富的最有效手段。对欧洲探险者而言,那个时代世界最为热门的探险家乐园就在东方,尤其是黄金国度——中国。

在家人的安排以及社会风尚的影响下,东方探险家头上的金色光环便深深印刻在斯坦因的脑海里,他从小便开始系统学习东方学。经过学习,斯坦因逐步精通了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和英语,又在欧洲著名的维也纳、莱比锡、图宾根等大学进一步学习梵文和波斯语等东方古代语言。1883年,年仅21岁的斯坦因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来到当时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后来加入英国国籍。

此后,斯坦因又用了三年时间,在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博物馆学习古代东

方语言、历史比较语言学和东方考古学,但他没有选择学习古老的中国语言——汉语,这是他完备的东方语言学习和训练储备中唯一的重大缺陷。十多年后,这一缺陷在使他成名的中国新疆考古探险中有了最为深切的体会,并使他与世界列强国家探险队、探险家在争夺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宝藏时吃了大亏。成名后的斯坦因每当念及这方面缺陷时,总会有一种切齿的追悔。

在英国学习期间,斯坦因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不得不中断学业,其中最长最重要的一次是被征召入伍,在匈牙利军队里服役一年,主要学习和从事野外大地测量。这种技能后来被证明非常有用。尤其是在英帝国与其他强国在中亚,主要是在中国西部尚未进行大规模大地测量地区的竞争中作用巨大。当然,斯坦因历次中国西部沙漠、山川中的探险活动之所以能够得到英国和英属印度当局的鼎力支持,也与英国首先进行帝国扩张急需的地理勘测大有关系。

斯坦因在中国西部地区考古探险所获古物、资料与研究成果,原汉译本序言已经有十分中肯的述说与评价,这里不再赘述。从1900年开始,斯坦因将全部精力用于中国西部、中亚古代遗迹探险考察与研究,其间他于1910年至1929年任职于印度考古局,1929年退休后服务于美国哈佛大学。

第一次中国西部探险(1900—1901):主要以勘测喀喇昆仑山地和发掘和田地区古代遗址为主,其旅行笔记为《沙埋和田废址记》(1903),正式考古报告是《古代和田》(全二卷,1907)。

第二次中国西部探险(1900—1908):在地理勘测之外重访和田重要古遗址,发掘安迪尔、米兰、楼兰等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汉长城沿线掘得大量汉简,进入莫高窟,以欺骗手段获得大量藏经洞出土敦煌写本、绢画和丝织品等。其旅行笔记为《沙漠契丹废址记》(1912),正式考古报告为《西域考古图记》(五卷,1921)。

第三次中国西部探险(1913—1915):在地理勘测之外重访和田、且末、若羌各地古遗址,并再次到敦煌莫高窟,获得大量敦煌写本,还发掘了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的古遗址,其正式考古报告为《亚洲腹地考古记》(四卷,1928)。同时还著有《在中亚的古道上》(三次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综述,1933)。



第四次中国西部探险(1930—1931):1925年,斯坦因筹划进行第四次中国西部考察,想以中英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作为经费,未能成功。1929年底,哈佛大学先邀请斯坦因至该校洛维尔研究院做十次关于中亚考察的报告,后聘他为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荣誉研究员,同时为他提供10万美元的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经费。在斯坦因的争取下,大英博物院也出资3000英镑。于是,1930—1931年斯坦因进行了第四次中国西部考察。

此时,针对外国列强探险队在中国西部大肆盗掘古遗址劫掠文物的行径,国民政府出台了文物保护法令,以及中国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等其他因素,1931年2月,斯坦因被迫终止了在新疆和田、且末、若羌一带的盗掘古物活动,经库尔勒返回喀什,并于当年5月底由蒲犁(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边卡出境,无功而返。斯坦因所有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的古物均暂存于当时英国驻喀什领事馆内,后经新疆省政府交涉,移交至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

斯坦因的一生异乎寻常,他的确将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他所认定的亚洲腹地考古探险事业,为此,终身未娶。斯坦因对待金钱与对待时间的态度十分一致。他一生衣食简朴,对待任何物品、劳务价格,不管是支出还是收入都计算仔细。不过斯坦因为人并不吝啬,做事慷慨大方,生活中绝不自我放纵似乎是其人生准则。对待亲戚、朋友、同事、助手、仆人在可以看得到的方面,他全部都做得慷慨大方,反映出他在意并善于打理社会关系和工作、生活环境的能力。在个人生活中,他总是按时进入书房,每天一口气写作10—12个小时,最重要的是书籍和文件资料。他那数量庞大的文件、资料全部装在普通大箱子里,以便于随时搬运。箱子上都有清楚的标记,如“私人信函”“校样”“日记”“工作笔记”“地图资料”“账目”“照片”等,不管到哪里他随时都可以工作。

有学者认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斯坦因作为一个普通出身的犹太人在基督教社会获得成功依然十分困难,而维持已有的成功则更加不容易。但斯坦因还是成功了,尽管他的事业与英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领土扩张密切相关。斯坦因从我国新疆、甘肃、内蒙等地肆意进行大地测量、发掘并劫走大量的珍贵文物,破坏古代遗址等行为,在极大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同时也严重地

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我国对英国探险队斯坦因考古报告、探险考察笔记的整理翻译始于 20 年前我们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合作,绝大多数重量级的报告和综述笔记也得益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与出版,例如《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沿着中亚的古代道路》,等等。此次《西域考古图记》的重新校译修订再版,又是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与精心组织下完成的。在此我谨代表组织翻译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所有译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特别需要向各位读者说明的是,本版因故删除了 94 幅地图,即 1998 年版的第五卷,其余内容均予以保留,仅对 1998 年版翻译不准确或有误的地方进行重新校译修订,使之在翻译质量和编校质量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此外,本版在分卷上做了重新划分,现将 1998 年版和本版的分卷说明如下。

1998 年版分卷:

第一卷:第一章至第十三章;第二卷:第十四章至第二十五章;第三卷:第二十六章至第三十三章,附录 A—附录 K,附图;第四卷:图版,图题;第五卷:地图,共 94 幅

本版分卷:

第一卷:第一章至第十章;第二卷:第十一章至第二十章;第三卷: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七章;第四卷:第二十八章至第三十三章,附录 A—附录 K,附图;第五卷:图版,图题

翻译工作组织者:巫新华

于北京王府井大街 27 号考古研究所

2018 年 12 月



出版说明

本书根据克拉伦登出版社 1921 年版翻译。

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涉及古今多种语言文字以及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美术、建筑等多种学科,是一部语言现象复杂、学科门类繁多的综合性学术专著。我们在组织翻译和编辑过程中,为解决所遇到的语言和技术上的问题,拟订了一些原则,特在此略作说明。

一、本书原名《西域(Serindia)——中亚及中国西部地区探察之详尽报告》,作者无理地将我国新疆地区视为中亚而划出我国疆界之外,所谓“中国西部地区”则专指我国甘肃地区,对此,我们一概不予承认,故此书翻译出版,定名为《西域考古图记》。

二、为保持原书的原貌,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由于时代的局限、文化的差异以及其他原因,斯坦因的原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由于历史的原因,斯坦因原书中的学术观点,有些不很正确;原书中的某些专业术语,表述上也不够规范。再者由于文化的差异,斯坦因原书中存在着一些知识性错误,如他把“开元通宝”误认为是唐高祖时期发行的钱币。尤其是斯坦因的探险考察还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文化掠夺的性质,因此,他的一些观点具有自我辩护的成分。对这些不足之处,我们在前言中予以总的说明,在正文中则不作具体分析。因此,读者在征引该书观点时要妥加甄别。对原书的专业术语,我们一律保留原貌,但为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在个别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于原表述词后加注说明,阐明译者的意见。



三、确保中文资料的准确性。斯坦因从他人译作中转引了《史记》《汉书》《唐书》《大唐西域记》《魏略》等我国古代文献。这些文献经过多次转译,必然出现偏差和失误。为了确保引文的准确性,我们不根据原文转译,而是对照我国古代文献资料直接抄录。原书附录 A 和附录 E 中引用了一些汉文简牍和文献,考虑到这些资料均已有正式出版物,故只存其目,或摘要翻译部分内容,并加上译者说明。

四、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著作名称等),均按通行译法翻译。一些译名虽不甚准确,但因学术界已约定俗成,故一仍其旧,不再另译。为便于读者准确把握原意,个别冷僻专有名词未作汉译;一些中亚古代文字写卷中的人名、地名,因目前尚无约定俗成的译名,故亦未作汉译。

五、保留原书的计量单位、文物编号及遗物排序等,以便于使用和检索。原书大量使用的计量单位(如里、英里、英尺、英寸、码等),均不换算成现行的法定计量单位;原书中的文物编号、遗址编号,均保留原貌;原书中的附录排序和遗物排序,均有不连续的现象,如原书附录的排序为 A、B、C、D、E、F、G、H、I、K,没有附录 J。这些,我们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均未作调整。

六、人名、地名及其他方面的专有名词,首次出现时,于汉译名后附注原文,以后出现不再加注。

七、为便于读者查找和对照,我们对“著作名称缩略表”作了汉译,并附上原文。

八、原书注释及正文中征引了大量的文献,凡“著作名称缩略表”中已列有者,均用缩略语表示,凡“见上文(下文)某页”者,一律改为“见上文(下文)某章某节”;原书注释以页为单位排序,译本以节为单位排序。

九、地图翻译的说明。本书地图所用地名多为 20 世纪初地名,许多地名俱是当地口语的音写,与现今地名出入较大。为保持原图资料的完整性,我们在保留原图音写地名的基础上,着重译出重要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绿洲、村庄等名称和各类遗址、遗迹名称,对那些无视我国主权的地理命名,我们一



律不予承认,并据有关资料对其作了修正。本书地图的翻译以国家测绘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局、甘肃省测绘局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名委员会的相关地图、地名资料为主要依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11月

